

马 克 思 著

资 本 论

郭大力 王亚南◎译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马克思 著

资本论

郭大力 王亚南◎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 / (德) 马克思著; 郭大力, 王亚南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5426-4263-9

I. ①资… II. ①马…②郭…③王… III. ①马克思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IV. ①A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495 号

资本论

著 者 / [德国] 马克思
译 者 / 郭大力 王亚南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王秀莉 陈海龙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1911 千字
印 张 / 112.25

ISBN 978-7-5426-4263-9/A · 7

定 价: 198.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依据郭大力、王亚南共同翻译，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再版的。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科学著作。它被奉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圣经”，是一部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是人类思想史上不朽的理论丰碑。直到今天，它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始于1928年1月。在“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推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鼓舞下，年仅22岁的郭大力，为了革命的需要，就开始翻译《资本论》，并在半年后译完第一卷。可惜这部译稿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中。

在此期间，郭大力结识了王亚南，追求真理的共同愿望使两个萍水相逢的热血青年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并约定共同翻译《资本论》。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一般的出版商都不愿意冒风险来出版这样一部著作，翻译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1937年初，翻译工作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我党直接领导的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社与他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党组织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怀，使他们深受鼓舞。从此，他们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翻译《资本论》。

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狂轰乱炸。郭大力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赣南老家。此前王亚南也离开了上海。两人在分散而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翻译工作，并将译好的稿件分批寄至出版社。1938年4月，郭大力应出版社的要求，经香港辗转来到上海，一方面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尚未完成的部分，另一方面负责全部译稿的统稿、校订工作。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紧张而辛勤的劳动，我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资本论》于1938年

8、9月在沦陷区上海租界内秘密出版了。

翻译这部《资本论》所依据的版本是经过当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对过的新德文版，并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译者在保证译文准确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了原著的风格和特色，而且文字流畅，通俗易懂。因而这个译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赏。许多革命青年和学者争相购买。据说宋庆龄、冯玉祥、邵力之等知名人士都购买了。毛泽东同志曾经读过这部《资本论》。

1938年出版的这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是我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也是1974年以前唯一的中文全译本。这部《资本论》的出版，使马克思这部伟大的巨著，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仅是我国翻译和出版史上的光辉一页，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这个版本又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多次重印。我们这次再版所依据的样书就是1948年8月在哈尔滨重印的。（这次印刷时，译者对最初印刷时错排、误译的个别字做了修正。）

对于这部《资本论》翻译和出版的意义，我国经济学界的老前辈许涤新先生于1982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部光辉著作译成中文，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国革命青年的殷切盼望……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在那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出版界里，有谁能有条件把这部二百多万字巨著全部翻译成中文呢？有哪个出版社有决心、有胆量敢出版这一部使资产阶级反动派发抖的《资本论》呢？感谢郭大力、王亚南二同志的劳作！感谢读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马克思这部前无古人的辉煌巨著，终于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心脏——雾重庆（不是在重庆，而是在沦陷区上海租界内——引者注）出版了！《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提高。一直到今天，这个译本还有重大的价值。”

正基于此，在目前全党全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我们再版了这部《资本论》。在编校上，除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从其旧貌。

原著者初版序

我现在刊行第一卷的这个著作，是 1859 年拙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自前书刊行到现在，已隔离了长久的岁月了。这是多年宿疾，屡次中断我的工作的缘故。

前书内容，已概述在此卷前数章内。此不仅为求连贯与完全。说明的方法也改良了。在情形许可的限度内，有许多点，只在前书略略提到的，在本书是论述得更详细了；反之，已在前书详细讨论过的，在本书，却仅略略提到。前书叙述价值与货币学说史的几部分，本书是完全删除了。但前书的读者，仍然可以在本书首章的注解内，对关于这两种学说的历史，获得若干新的资料。

一切事在开头总是困难的。这一句话，可以在一切科学上适用。第一章（尤其是分析商品的那部分）的理解，是最难的。关于价值实体与价值量的分析，我已尽可能通俗化了^①。以货币形态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态，是极无内容，极单纯的。二千余年来，人类考究这种单纯形态的精神努力，是毫无结果的。反之，对内容更丰富且更复杂的形态的分析，却至少已近于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构成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在分析经济形态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药，而必须用抽象力。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劳动生产物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是斤斤于细故。其所考究，诚为细故，但其所为，与显微镜下的解剖，正是一样。

除论价值形态的那一部分外，这书决不能说是难解的。当然，没有修学志愿又不愿有独立思想的读者，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物理学学者必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充实且最不受他物影响的地方，视察

^① 拉塞尔（F. Lassalles）在驳斥苏尔兹·德利希（Schulze Delitzsch）的文章内，虽自称已将拙见的“神体”提示出来，实则包含着严重的错误。想到这点，我觉得，我益加有通俗化的必要。——附带我还要说，拉塞尔会从拙著，逐字引用（但绝未声明），当作他经济研究上的一般的理论的命题（例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的关系等等）。那或许是为宣传的目的。当然，我们说的，不是他的解释和应用。这一层，我是没有做的。

自然过程；如可能，还在过程确系正常进行的条件下，作种种实验。我在本书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这种生产方法的故乡还是英国，因此，在理论的说明上，我常以英国为主要的例解。但若德国方面的读者，竟伪善的，对于英国工农劳动者的状况，耸一耸肩头，或乐观的，以德国情形未必如此坏的话，安慰自己，我就必须告诉他说：“这也正是阁下的故事。”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法则，引起社会的对立。我们原来的问题，不是这种对立已发展到怎样高的程度。我们所问的，是这种法则的本身，是这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彻底的作用之趋势。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将来的景象。

如舍此不言。德意志已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地方（例如真正的工厂），因无工厂法的对抗力，情形就比英国坏得多。在其他范围，德国是像西欧大陆各国一样，不仅受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苦，而且受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种种痛苦，还有许多旧传的痛苦，压迫着我们。这种种旧传的痛苦，是古生产方法依然残存的结果，而这种古生产方法的残存；自然会引引起种种时代错误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我们不仅吃生者的亏，且吃死者的亏。死者叫生者烦恼。

德意志及西欧大陆各国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的社会统计比较，是更贫乏得多的。

但这种社会统计，依然足以揭开黑幕，叫我们窥见幕内的夜叉的脸面。假令德国的政府与国会，能像英国的政府与国会一样，定期派遣委员去调查经济的状况；假令这种委员，又能像在英国一样，有探求真理的全权，且能有像英国工厂监督专员，公共卫生报告员，女工童工榨取状态居住状态与食物状态的调查委员那样，才能胜任的，无党无私的人来充任，我们对于德国的状态，也一定会愕然失惊的。波西亚斯（Perseus）戴起一顶隐身的帽子，叫被追逐的魔鬼看不见自己。我们德国人却把隐身的帽子，紧遮着耳目，说没有魔鬼。

我们不要在这点欺蒙自己。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已为欧洲的中等阶级鸣起警钟。19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又为欧洲的劳动阶级鸣起了警钟。在英国，革命的过程是极明显的。这个过程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必会在大陆方面发生反应。在英国，这个过程，有时是采取更残忍的形态，有时是采取较缓和的形态，那是看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的程度而定。所以，英国现在的支配阶级，即使没有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自身利害打算，而将一切可以由法律废止的，干涉劳动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在许多理由中，这

也是我在本书细述英国工厂法历史、内容与结果的一个理由。一个国家，应该从外国学，也能够从外国学。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连动法则，但一个社会就令已经把自身的运动法则发现，也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废止自然的发展阶段。它只能把生育时的痛苦减短或缓和。

为避免万一发生误解起见，且附带声明一笔。我决非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地主的姿态。在此，一切个人，都被视为经济范畴之人格化，被视为特殊阶级关系与利益之代表。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从我的立场看，乃是自然史上的一个过程。无论个人在主观方面可以怎样超出周围的种种事情，他在社会方面总归是周围种种事情的产物。从我的立场看，他对于这种种事情的发生，是和别的人一样不负责任的。

自由的科学的研究在经济学范围内所遇到的敌人，不仅和它在其他范围内所遇到的相同。经济学研究的材料，含有一种特殊的性质，那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害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成为自由的研究之敌。例如对英国教会。你在三十九个信条中攻击了他三十八条倒不要紧，他也许还会原谅你，但若你在他的收入中，夺去了他的三十九分之一，他一定恨你入骨。在今日，与批判旧财产关系的批判论比较，无神论还是比较轻的罪。但就这一方面说，进步依然是明明白白的。例如英王驻外代表数星期前发表的一种蓝皮书，名叫“驻外使节关于产业问题工会问题的通信录”的，就曾力言，劳资现存关系上的变动，在德意志，在法兰西，总之，在欧洲大陆各文明国，将会像在英国一样明白，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副总统威德君（Wade），也在公众大会上宣称，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资本与土地所有权关系上的变化，将成为继起的问题。这是时代的征象，决非紫袍黑衫所能遮掩的。这种种事实，不足证明奇迹将在明日发生，但可以证明，在支配阶级本身也超了一种预感，感到了现社会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的，且不断变化的有机体。

本书第二卷将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与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三册）；第三卷即终卷（第四册）将讨论学说史。

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我都欢迎。以所谓舆论为根据的偏见，却是我从来不让步的。关于这种偏见，佛洛伦大诗人的格言，便是我的格言：

“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

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伦敦

原著者第二版跋

现在先向第一版读者，报告第二版有着怎样的变更。书的篇别，一看就知道，是更一目了然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注明是第二版注。就本文说，最重要的变更，则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即分析交换价值方程式并泛论价值的那一节，是科学地改得更严密了。又，第一版仅仅略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的关系，也表现得更严密了。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态）是完全改作了。第一版的二重说明，使我们必须如此作。——在这里，我可以附带说一说，这种二重的说明，是经友人汉诺威的库格曼博士（Dr. L. Kugelmann）的劝告写的。1867年春，当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为大多数读者计，对于价值形态，必须有一种补充的讲义式的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也大部分改作了。第一篇第三章（价值尺度）也经过绵密的修正，因为这一节在第一版，不过提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所已提示的讨论，是讨论得不甚周密的。第七章，尤其是当中的第二节，也大大地改作了。

当然，把各处原文的改正一一列举出来，是没有用处的。这种改正，多半是文体上的改正。这是全书都有的。我现在正在校订巴黎发行的法文译本，在这样校正时，我发觉，德文原本有许多部分，在某场所，必须有更彻底的改作，在某场所，必须更在文体上改正，或将偶尔的错误，加以绵密的删削。但时间不许我这样做。因为1871年秋，我正忙于进行别一种紧急工作时，曾接到通知说，第二版的印刷，至迟须在1872年1月开始。

《资本论》迅急在德意志劳动阶级的广大范围内，得到了理解。这种理解，对于我的劳动，是一种无上的工资。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梅耶先生（Meyer），维也纳的工厂家，也曾在德法战争中发行的一本小书上，力言大的理论感受性——这个东西，屡屡被称为德意志的世袭财产——已在德意志所谓知识阶级中完全丧失，但却在德意志劳动阶级当中复活起来。

直到现在，经济学在德意志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湾·居

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在其所著《工农商业之史的发展》，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书第一第二册中，曾详细考察到：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从而，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树立，曾受到那几种历史事情的阻碍。经济学在德国发展的地盘，依然没有。这种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二国输进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在他们手上，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从这个世界的情形来解释，这种种理论是被误解了。他们觉得在科学上自己没有多大的力量。他们还感觉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讨论的问题，实际是自己所不熟习的问题。他们大都凭借学说史之博学的美装，或杂凑各种无关系的材料——那是由所谓官房学（Kameralwissenschaften）借来的，那是一种知识的混合物；德意志官僚的失意的候补者，没有一个不要通过这一个炼狱——来掩饰。

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德意志迅速发展了，现今还正好在迷人的开花时期。但我们的专门家，时运还是不佳。当他们能够公平研究经济学时，近代的经济关系在德意志还缺少现实性。而这种关系生出之后，在资产者视野之内，又不许再有公平的研究了。经济学，在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限度内，换言之，即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却把它视为社会生产之绝对的最后的形态的限度内，它只有在阶级斗争仍在潜伏状态中，或仍为间或发生的现象时，可仍为科学。

以英国为例来说罢。英国古典派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未发展时期的，其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里嘉图（Ricardo），素朴地承认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即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是社会的自然法则，他还有意识地，以这种对立为研究的出发点。但从此出发，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达到了它不能跨过的限界了。因此，在里嘉图时，经济学已从里嘉图反对的方面，受到西斯蒙第（Sismondi）这样的人的批判。

继起的时期（自1820年至1830年），在英国经济学界，是科学活动极蓬勃的时期，是里嘉图学说庸俗化与普及化的时期，也正是里嘉图学说与旧派互相斗争的时期，这一场比赛，真是好看煞人。但因论辩主要是散在杂志的论评上，论述时事问题的著作上，小册书上，所以这种论战，不大为大陆方面知道。这一次论战的天真无私的性质——但里嘉图学说，在例外的情形下，已被用为攻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形来说明。1825年发生的恐慌（此为近代生活周期循环的开始），固然是大工业已脱离幼稚时期的证明，但它还是刚刚从幼稚时期脱离。资本与劳动间的阶级斗争，又在下述两种斗争前面，不得不暂时搁在幕后，即在政治方面，

各政府与各封建诸侯正开始在神圣同盟周围集合，与资产阶级所统率的人民大众互相倾轧；在经济方面，产业资本与贵族土地所有权也互相抗争不止（这种抗争，在法国，是隐蔽在大地主与小地主的抗争后面，在英国则以谷物条例为背景，公然爆发）。英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学文献，颇叫我们想起魁奈医生（Dr. Quesnay）死后法国的经济的狂飙时期。但这只好像良辰美景的秋日，叫人想起春天。1830年，决定的危机就发生了。

英法二国的资产阶级，都已在那时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抑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都益采取公开的威吓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不是真理与非真理的问题，只是于资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违背警章抑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真正的科学考察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反谷物条例同盟在工厂主科布登（Cobden）与布赖特（Bright）领导下滥发的小册子，因曾对土地贵族提出论争，故虽无科学的意义，但还有历史的意义。但庸俗经济学的这个最后的刺激，自庇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就位以来，也被自由贸易主义的立法夺去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在英吉利，也曾发生反应。不愿单为支配阶级辩护，不愿单向支配阶级献媚，仍相当要求科学意义的人，就尝试以资本的经济学和已不容忽视的无产者的要求相调和。于是，一个浅薄的折衷派发生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代表。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宣告。关于此事，俄国的大学者大批评家车尔尼舍夫斯基（N. Tscherneschewsky）曾在其所著《穆勒所倡导的经济学说的纲要》中，说得很明白。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德国还没有成熟时，其对立性质，已在英法二国，在历史斗争的形态上，成为众目昭彰的事实了。同时，德国的无产者，又比德国的资产者，有着更确实的理论的阶级意识。所以，这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好像可以在德国成立了，但实际依然不能成立。

在这情形下，德意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论者，分成了二组。一方面是聪明的营利心重的，实际的人。他们集合在巴斯夏（Bastiat）（庸俗经济学辩护论者中最浅薄最成功的代表）的旗帜下。他方面是以经济学教授投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在约翰·穆勒之后，企图调和那不能调和的东西。所以，德意志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时代，固然只是生徒，是盲从者，是摹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子；在其没落时代，也是这样。

德意志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德意志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不能

有独创的造就，但批判是不包括在内的。这种批判如果可以代表一个阶级，那么它只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之历史的使命，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颠覆和阶级的最后的废除。

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辩人，博学的，无学的，当初都想用沉默把《资本论》闷死，这是他们对付我以前各种著作的老法子。当他们发觉这种战术已不合时势之后，他们才以批评为名，想写下一个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在工人报纸——例如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在《共和国》发表的论文——上，他们却发现了较他们强而有力的战士。对于这些战士，他们直到现在，还是没有答辩^①。

资本论已有一个优秀的俄文译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圣彼得堡。初版3000册差不多销完了。1871年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西伯尔君（N. Sieber）已在其所著《里嘉图的价值理论与资本理论》中，认定我的价值，货币，与资本的理论，根本是斯密，里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完成。他还说，西欧人阅读这个优秀的著作而感到惊异，是因为著者能一贯保持纯理论的立场。

《资本论》应用的方法，常不为人理解。这一点，可由各种关于本书的解释的互相矛盾而知。

例如，巴黎的实证主义评论，既责我以形上学方法讨论经济学，又责我仅从事于一定事实之批判的分析，不为将来的食堂，写出调味的方法来（实证主义的吗？）。关于形上学云云的责难，西伯尔教授曾答说：“在所论为纯粹理论时，马克思的方法，不外是英吉利学派所通用的演绎法。其缺点与优点，也为最上乘的理论经济学者所共有”。布洛克君（M. Block）在《德意志社会主义理论家》一文（1872年7月号8月号《经济学杂志》，曾将该文摘录）中，却发现我的方法是分析的，并且说：“著作这书的马克思，必定是分析能力最强的人”。德国的评论家，则大声非难我的黑格尔式的诡辩。圣彼得堡的《欧洲通信》，曾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资本论的方法

^① 德意志庸俗经济学的空口的饶舌家，曾非难拙著的文体及其说明方法。《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任何人都没有我那样痛切地感觉到。不过，为使这一班大人先生们和他们的读者快意起见，我且在这里引述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俄国人的批评在下面。《星期六评论》虽完全反对我的见地，但关于《资本论》第一版，该志却批评说，该书的说明方法，“把一个最枯燥无味的问题，也说得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圣彼得堡杂志》1872年4月20日号说：“除一二特别专门的部分外，该书的说明方法，是以容易理解，明畅，和异常活跃（虽说它所讨论的，是科学上异常繁杂的问题）为特色的。就这点说，该书作者……与大多数德国学者，极不相同。……那些学者，用非常枯燥，非常暧昧的文字来著书，简直把普通人的头都榨破”。但现时德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教授的著作所榨破的，却完全不是读者的头。

(见1872年5月号427页至436页)。该文说,我的研究方法,纯然是实在论的,但我的叙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辩证法的。他说:“骤然依照它的叙述的外形来判断,我们一定会说,马克思是一位最大的观念论哲学者,并且是德意志式的从恶意方面解释的观念论哲学者。但在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上,他与任一个先驱者比较,都更是实在论者。……我们决不能称他为观念论者”。为答复这篇论文的作者,我最好从他的批评,摘录几段在这里。这种摘录,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或者有点益处。

这位作者,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序(柏林,1859年版,序第6页至第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论的基础——中引用一段话之后,说:“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所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但他认为重要的法则,不仅是已在一定时期具有完备形态且保持相互联系的现象之法则。他更着重的,是现象变化的法则,是现象发展的法则,是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系列关系到他一系列关系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发现,他就进一步,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的种种结果。……所以,马克思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由严密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的次序的必然性,并对于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种种事实,尽可能,予以完全的确认。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只须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证明现在的秩序所必须推移进去的秩序,也有其必然性,至若人是否相信它,是否意识到它,那倒是一点不关紧要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运动,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则,不仅与人的意志意识意图相对而言时,是独立的,并且是人的意志意识意图所由以决定的。……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位置既然如此低,则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自不能以意识的任何形态或结果为基础。这就是说,能作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职务,不是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事实和事实来比较对照。在这种批判上,最要紧的,是两种事实必须尽可能的同受正确的研究;是这两种事实必须在互相对待的限度内,成为同一发展过程上的相异的要素。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正确研究诸秩序的顺序,研究诸发展阶段的次序与联络。有人说,经济生活的一般法则永久是相同的;适用于过去的法则,也必适用于现在。但这正是马克思否定的事情。依他说,抽象的法则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见,每一个历史时期,皆有它特有的法则。……生命通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阶段向他一阶段推移时,它就开始受别一些法则支配。经济生活上呈现的现象,与生物学领域内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以经济法则比于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他们是把经济法则的性质误解了。

……更深刻的把现象分析一下，便知诸社会有机体间，和各种动植物有机体间一样，是有根本的差别的。……且不只此。同一的现象，也因各种有机体的全部构造不相同，因它们的个别器官不相同，因这各种器官作用的条件不相同等等，而须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则。例如，马克思就否认人口法则是任何时任何地皆同的。他主张，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则。……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关系与支配社会关系的法则也不同。马克思的目的既然是从这个见地，研究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所以他所不得不做的，只是严密地，科学地，把经济生活的正确研究所必须有的这个目标，树立起来，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阐明一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由它进到高级社会有机体的演变，是受何种特殊的法则支配。马克思这书实际也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既如此正确地，叙述了我的真正的研究方法，又如此好意地，叙述了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还是什么呢？

叙述的方法，当然须在形式上与研究的方法分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不过，叙述一经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那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法，不仅在根本上与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不同，且正相反对。在黑格尔，思惟过程——他给它以“观念”的名称，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之创造主；现实仅为思惟过程的外部现象。但在我，观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并翻译在人类头脑中的物质界。

在黑格尔辩证法仍甚流行的将近 30 年前，我已批评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姿容。但我著作《资本论》第一卷时，猖狂的，自负的，在今日德意志知识份子中颇为人所信任的庸人，却已像莱辛（Lessing）时代的摩塞·门德尔桑（Moses Mendelssohn）对待斯宾诺莎（Spinoza）一样，对待黑格尔，把他看做是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倒公然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在论价值学说的那一章，我还间或采用黑格尔特有的方法来卖俏。辩证法虽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综合地，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态的，仍须以他为第一人。在他手上，辩证法是倒立着。必须顺过来，然后才能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为它使现存事态显得光彩。但在其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这是因为，对于现存事态，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它还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现存事态必然归于消灭的理

解。这是因为，它认为每一生长的形态是在运动的流中，是暂时经过的；因为，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压，在本质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充满矛盾的运动，在近代产业的周期循环运动的转变中，最深刻地，印在实际的资产阶级心中。这种转变的顶点，是一般的恐慌。在当前，恐慌尚在初期状态中，但却在向前进展。恐慌舞台是多面的，它的作用是深刻的，以致连神圣普鲁士·德意志新帝国的暴发户们，也不免要领教辩证法了。

马克思

1873 年 1 月 24 日伦敦

法文译本之序与跋

摩里斯·拉·霞特先生：

亲爱的先生！足下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译本的意思，我是十分赞成的。在这个形态上，这个著作必定更能与劳动阶级相接近。而在我看，这个考虑又比任何别的考虑都重要。

这是足下的计划的好的方面；但这个计划也有它的缺陷。我所应用但尚未在经济问题上使用过的分析方法，使最初数章的阅读最难。法国公众常常是没有耐心，急求结论的，他们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和他们所直接关心的问题的关系。我恐怕，不能在开始就具有全书的情形，或者不免使他们觉得失望吧。

这是一种不利。对于这种不利，我只有事先声明，请渴求真理的读者注意。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

你的诚实的 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伦敦

致 读 者

洛易（J. Roy）先生曾要尽可能，使翻译成为正确的，逐字直译的。但就因为他这样力求忠实，所以我不能不把行文的文法改变，使它更容易被读者了解。但这书是分册出版的，这些改变也全是匆促完成的。我做这种校正工作时，前后既不能有一贯的注意，文体也自不免有前后参差的地方。

我既从事这种校正工作，所以又乘这个机会，将所根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也整理一番。有些地方，说明是简单化了，有些地方，说明是更

完全了，有些地方，加进了若干补充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有些地方，增入了若干批判的注解等等。这个法文本，或许有文学上的缺点，但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上的价值；懂得德文的读者，也有读一读它的必要。

我还要请读者参看第二版跋文的若干段。这篇跋文，曾经说明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及本书应用的方法。

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伦敦